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3】

西藏历史 问题研究

张 云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3】

西藏历史问题研究

张 云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图亚 封面设计：李建雄 技术编辑：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张云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ISBN 7-80057-747-3

I. 西... II. 张... III. ①西藏问题—研究②西藏—

地方史—研究 IV. ①D677.5②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209 号

西藏历史问题研究

张云 著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发行：中国藏学出版社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98 千

印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1500 册 (平)

书号：ISBN 7-80057-747-3/K·119

定价：16.00 元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专刊编委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

陈得芝 陈高华 恰白·次旦平措

蔡美彪

主编

拉巴平措 陈庆英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巴桑旺堆 王 尧 周伟洲 周 源

张 云 冯 智 王维强 马丽华

冯 良 林冠群 喜饶尼玛 石 硕

沈开运 邓锐龄

《西藏通史》系列丛刊总序

拉巴平措 陈庆英

从2002年年中开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国家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西藏通史》。本丛刊汇集出版的是该课题的一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

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全区的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2.8%。西藏自治区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相连，东面与四川省、云南省相连。另外，西藏自治区还从西北到东南沿喜马拉雅山脉漫长的边界线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等国接界，国界线长达4000多公里，是中国的国际边界线最长的省区之一。西藏自治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据1993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西藏全区人口为228.88万，其中藏族占95%以上，其他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等。

西藏地方处于东亚和南亚、中亚交汇的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特殊，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西藏地方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西藏通史》的课题要求，

就是要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反映西藏自治区的地方历史发展过程，展现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通史》与现今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通史一样，属于地方通史的性质。

西藏通史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时间上说，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有上万年的人类活动的历史，沿用至今的藏文的历史在 1300 年以上。从领域上说，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演变都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这些领域的许多部分的学术研究还很薄弱，还有许多重要的课题需要从整理资料入手，进行开拓和探索的工作。在资料方面，西藏通史的大量的内容记载在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文的史籍和档案中，学术界对此已经做过很多汇集和整理的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没有整理公布。利用藏文、汉文史料还有许多翻译、比对和综合研究的工作，这些都是很难在短时间里能够完成的。另外，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外的藏学研究成果）也需要整理和吸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争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西藏通史和作为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的藏族的民族历史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写作《西藏通史》的时候就遇到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的问题。根据藏族历史和西藏地方历史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本书的内容处理上，在元代划分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以前，是以西藏地区为主，包括藏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也即是包括了甘青川滇藏族地区的一些历史，在元代以后则是西藏地区本身的历史。这样处理也比较符合西藏地区几千年来始终是广大的藏族地区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的历史事实。

由于《西藏通史》课题涉及的内容广泛和具有的难度，仅

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完成，在课题立项以后，我们向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地的藏学界的同仁请求帮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专家参加了部分分卷和章节的编写工作，有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自己多年收集的宝贵的资料，或者提供了自己有关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界同仁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我们非常钦佩，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谢意。同时考虑到许多专家学者耗费大量心血而凝结成的许多成果，不能在《西藏通史》的正文中完全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编印内部参考资料的同时，得到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决定将部分与《西藏通史》有关的研究成果以《西藏通史》系列丛刊的形式出版，一方面体现我国藏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同时通过这些成果的出版，为西藏历史和藏族历史的研究工作打下更好更宽的基础，促进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特别是西藏历史的研究工作更快地发展。

目 录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说略	(1)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若干问题	(23)
怎样认识和对待西藏历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	(42)
关于正确评价历史上中央政权的西藏政策问题	(56)
西藏地方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	(75)
茶马古道长，藏汉情义深	
——西藏和内地之间茶马古道探幽	(84)
西藏地方政权兴衰与中原王朝兴衰的关系问题	(94)
乾隆皇帝治藏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础	
——以《喇嘛说》为中心	(108)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成与版本问题	(120)
论历史上的“安藏必先安康”	(137)
论所谓的“供施关系”	(156)
“大西藏”与“西藏独立”的梦想	(167)
再论西藏行政区划与“大西藏”问题	(180)
评“蒙古满洲非中国”说	(192)
评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	(206)
西藏属于中国的说法不容歪曲	(227)
西藏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与历史命运	(232)

民族学与当代民族的历史命运	
——以西藏的发展与问题为中心	(251)
西藏历史研究法的困惑与出路	(266)
附录一 20 世纪西藏历史研究概述	(275)
附录二 西藏与内陆亚洲研究概述	(323)
附录三 1996 - 1997 年藏族历史研究概况	(347)
附录四 伯戴克教授与他的《中部西藏与蒙古》 一书	(355)

Contents

- I . Simple Introduc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Inland of Our Country
- II . Some Problems about Tibet Being a Part of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
- III . How to Regard and Treat Several Important Problems in Tibetan History
- IV . How to Correctly Evaluate Policies of Central Regime to Tibet in History
- V . Relations betwee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ibetan Local Regime and That of the Dynasties in Central Plains
- VI . The History of Tibet's Participating – in and Identifying – with China's Great Unification and Its Inspiration
- VII . Tea – Horse Trade Route—Linking Tibet with the Hinterland
- VIII . Thought Basis of the Policies for Emperor Qianlong to Administrate Tibetan Religion
- IX . Formation and Edi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Twenty – nine Rule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Imperial Order on Tibet
- X . Policy about “Appeasing Khams before Tibet” in Chinese History
- XI .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Benefaction (yon

mchod)

- XII . Dreams of “Great Tibet” and “Independent Tibet”
- XIII . Re – Discussing Tibetan Regionalism and the “Great Tibet”
- XIV . Comment on Statement that “Mongolia and Manzhou do not Belong to China”
- X V . Comment on the Book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By Zhwa sgab pa dbang phyug bde ldan
- X VI . Saying that Tibet Is A Part of China Cannot Be Distorted
- X VII . Internal Charm and Historical Fortune of Tibetan Traditional Culture
- X VIII . Ethn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Fortune of Today’ s Nations : Centr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of Tibet
- X IX . The Confusion and Outlet in the Method of Tibetan History Study

Appendix

Summary of Studies on Tibet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Summary of Studies on Tibet and Inland Asia

Summary of Tibetan History Studies from 1996 to 1997

Prof. Luciano Petech and His Book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略说

一、语言、血缘和文化渊源上的密切联系

藏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远古时期就保持着血肉联系，这种联系较民族的形成早。民族，如众所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远不能涵盖藏汉两族先祖血缘和经济文化上交流的全部内容，也远没有后者来得悠久。从考古学、古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就来看，西藏高原地区原始居民与内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也就是古代人民共同体形成的早期，而且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原始的共同语言上，而且也表现在血缘上和文化上。

（一）古汉藏语和人种同源问题研究的结论

语言学界关于语言族系的划分存在某种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学术界对汉藏语系这一划分的广泛认同，已经是客观事实。国内外学术界对古代汉藏语同源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有成果推出，为这一论断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美国学者包拟古的《原始汉语与藏语》一书，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收录了作者的四篇文章，第一篇“藏文的 *sdud*（衣褶）与汉语的‘卒’及 *st* - 假说”；第二篇“藏汉语中带的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第三篇“原始汉语与藏语：建立两者之

间关系的若干证据”。后一篇文章长达 15 万字，讨论了 485 个相互关联的藏汉语字，指出在先周朝时期已经存在同源词问题。^[1]也就是说，在西藏高原地区的居民还处在原始部落状态时期，就和汉族先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基础。

俞敏教授的《俞敏语言学论文集》一书，也是包括着作者对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的诸多成就，该书中收录有关汉藏语同源的论文 5 篇：第一篇《汉藏同源字谱稿》收录约 600 个同源字，发现藏语（吐蕃语）和春秋战国齐人（姜姓，神农氏后裔）语极像，而且不只限于词汇；第二篇《汉藏虚字比较研究》；第三篇《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第四篇《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第五篇《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结论是“汉藏本是一个母系氏族分出来的”^[2]。更直接指出了汉藏人和话同源问题。而语言是民族十分重要的特征之一，共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部落之间相同的血缘和民族文化联系。

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和南岛语是蒙古人种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比较表明它们的原始语是古老的，是史前的语言。^[3]而蒙古人种包括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和美洲的印地安人，可以划分为北亚、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美洲印地安人等不同类型。蒙古人种是这一地区晚期智人在距今 3 万年至 2 万年中形成的。分布在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典型蒙古人种在距今 1 万年前已完全形成。^[4]原始藏缅语夏代以前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5]有学者认为，旧石器晚期华南、华中的砾石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的汉藏、南岛和南亚语系文化的共同源头。砾石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为汉藏文化的体系，新石器中期已经成为多种多样的文化，此即汉、藏缅、侗台和苗瑶文化的源头。早在夏代时期，四川、云南和西藏已经分布有大墩子—礼州文化和卡若文化。川西北岷江上游河谷地区的建山寨类型文化的风格和马家窑文化相近，说明夏商时代黄河上游南下的文化，应是早期的藏缅文化。直到商代，黄河流域

的居民以鼎为礼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鼎为炊具，“鼎代表着最初的汉藏文明”，在先商时期，藏缅语的分布范围要比汉语更广阔。^[6]

藏族和汉族的先民同属于蒙古人种，而且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繁衍生息、迁徙流动，以及相互交往中，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原始汉藏语同源问题，是反映这一事实的诸多方面之一。

（二）上古汉文史书的记述

根据古代民间传说，汉藏两族人民血脉相连。上古时期，藏族的祖先古羌人和中原先民在血缘上和民族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记载：在神农氏之前的“共工氏”为姜姓，而“姜”则是羌人女子之姓。神农氏也是姜姓，其“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等，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等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7]《左传》哀公九年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共工氏、神农氏和炎帝都与古羌人有密切的关系。

《国语·晋语》说：黄帝和炎帝还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帝的曾孙帝嚳的“元妃”即是姜人部落的女子，叫姜嫄，生后稷，为周人祖先。夏王朝的祖先大禹，据说也是羌人，所谓“禹兴于西羌”。^[8]

先秦时期，西羌有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剡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闲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

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9]他们的居住地在今天甘肃临夏到青海湟中一带，河西陇右广大地区也分布着羌人部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獠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0]中原地区政权和西部羌人势力一直处在互动状态，中原地区内乱和分裂时期，强大的羌人部落就不断深入内地，而当中原政权，特别是陕、甘一带的地方政权强大时，他们的西向扩张往往迫使羌人朝青藏高原纵深迁徙，游牧经济自身的流动性，以及在部落人口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牧地严重不足所造成的压力，也使羌人在很早时期就行踪遍及高原各地。这一发展既是羌人部落壮大的产物，也与西羌和高原其他部落相互融合有密切关系。

汉唐汉文史书中记载了古代流行的一种说法，即吐蕃为古羌一支，《新唐书》即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鹑提悉勃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11]其实，这一说法并非欧阳修、宋祁所自创，而是对唐宋时期存在的有关吐蕃来源的重要说法之转述。这一说法，也在中国史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有些学者还直接把藏族和古羌等同起来，姚薇元先生就指出：“要言之，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约当东晋时，其中一部名‘发’羌者统一诸部、建立大国，诸羌因皆号发族，而对异族则称‘大发’（Teu Bod）。”^[12]顾颉刚先生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吐蕃是羌人在西陲建立的大

国”^[13]。马长寿先生认为：“发羌在河曲以西的黄河发源处。黄河发源在青海中部，西南距西藏尚有数千里，如何能把青海黄河河首的发羌与西藏王系的起源地拉扯在一起呢？故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14]这里涉及一个民族族源和王族族源的分别问题，如果把发羌首领就等同于吐蕃赞普，那么就如同马先生所说，绝不可信。但是如果说吐蕃的民族族源与西羌有千丝万缕联系，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

综上，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古羌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华夏族最重要的先祖部落之一，也可以说它是华夏文明的创立者之一，同样也是汉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汉唐史籍大多都把藏族先民吐蕃与古羌人等同起来，事实上西羌也是藏族的主要祖先部落，西羌是汉藏两族全方位联系的纽带，也是汉藏两族共同的祖先部落之一。

（三）考古发现展示出两地的文化联系

上古时期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而往往停留在是非界限模糊的传说之中，考古学通过对地下实物资料分析和研究，重现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片段，特别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片段，并通过古代文化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和本质性的特征来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同文化的共性特征，帮助人们勾勒上古时期的历史轮廓，恢复历史真实。从已有的考古成果来看，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中原文化，特别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诚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甘肃、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中的彩陶、打制石器与西藏昌都卡若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卡若早期的圆形或者半地穴房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青等地马家窑系统中的传统居住形式。而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米，更是黄河流域地区的典型作物，应该是通过甘青地区传入西藏地区的。^[15]不仅如此，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还存

在一个民族走廊，古代氐羌和西北地区其他各族通过这里辗转南下，进入四川、云南，甚至东南亚地区，同时也进入今西藏地区，与居住在西藏地区的其他古老部落一起，为西藏原始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羌人南下也不止民族走廊一途，对于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自身具有抗缺氧能力，又以游牧业为生的羌人来说，唐古拉山并不是高不可翻的绝顶，从青海等地到达西藏地区存在着许多游牧人迁徙的传统道路。如果我们看到后来吐蕃王朝时期，吐蕃的军队轻松进入青海地方，就不难理解和他们有类似情形的青海等地羌人进入西藏也属易事。西藏北部的细石器文化和北方蒙古高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尚且存在密切的关联，和青海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之类型相同，自然不难理解。^[16]考古上文化的紧密联系，反映出人们之间的类属关系，及相互交流的规模与程度。远古时期，西藏和黄河上游地区，以及蒙古高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并且会越来越多地为考古资料所印证。

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紧密联系

西藏地区和内地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联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地理环境造就的差异，引起的相互交流与依赖；一是物质文明成就上存在的差别导致的交流与需求。

就自然形态而言，高原游牧经济和内地农业经济有着强烈的互补性。西藏高原地区，由于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出产一些特有的高原植物、农作物和其他珍稀物品，但是内地出产的为数更多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却是西藏所缺少的。例如，西藏高原地区出产的牦牛、藏羚羊、马等动物，青稞等特色植物，以及麝香、藏红花等药物，都是名贵和珍稀的物品，很早就作为“方物”以朝贡，或以交流方式赠送给内地统